

李 吉 何世彪著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的开端

求 索 杂 志 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

李 吉 何世彪

求 索 杂 志 社

1988·长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

李 吉 何世彪著

●
求索杂志社出版

(长沙市德雅村)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字数170000

求索1988年增刊

统一刊号: CN43-1008 定价: 2.50元

前 言

党创立至大革命时期（1921年7月—1927年7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五四运动拉开序幕，到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开始实际进行的时期，因而即是中国近代革命，由屡遭失败到开始转向最后胜利的时期。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说，这个时期，又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开始全面传播和最初应用的时期，因而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中国化、中国无产阶级哲学萌芽的时期。它无论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政治思想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此，这个时期历来是理论工作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以往的研究多限于党史、革命史和政治思想史的领域，却没有从哲学方面进行研究的专著。本书就是试图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研究这个时期党及其领导人的思想与实践的一部论著。

从纵的方向上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新特点之一。在这方面，湖南、江西、四川、陕西等省的有关出版单位，已先后出版了《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和《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研

究》、《中国当代哲学史稿》等书，尚缺党创立至大革命时期的。本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使我国学术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构成较为完备的链条体系。

本书共有五章。第一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介绍和传播的队伍、渠道、内容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等四个问题，系统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至大革命时期，由启蒙式介绍到开始被中国共产党人实际应用的历史；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期间介绍和传播的一系列变化及其缘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中国无产阶级哲学萌芽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章主要依据党创立后，特别是二大后至大革命失败前，党及其领导人在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论阐发方面，尤其是在实际应用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论述了中国无产阶级哲学萌芽的涵义、起点、标志和三大类型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第三、四、五章，就是作者根据对党创立至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三大类型及其主要代表的认识，进一步分别论述了李达、瞿秋白、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内容、创见、特点和地位，因而深化和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中国无产阶级哲学萌芽这一主题。

由于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党史文献，特别是在论述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时使用了许多新资料，同时又注意吸取有关专家学者近些年来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本书不仅在系统化、条理化方面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提出并回答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个人和其他领导人的哲学思想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现有的论著中，不外这样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方法，是根

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原则上强调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写的仍是毛泽东个人的哲学思想，并没有把其他领导人的哲学思想结合进去；另一种方法是，既写了毛泽东个人的哲学思想，也写了其他领导人的哲学思想，但是一个一个孤立写的，缺乏分析综合和比较研究，不能构成有机的整体。本书将中国无产阶级哲学萌芽看成为一个整体，把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哲学思想置于其中，运用对照比较方法，论述他们的同点和异点，作用和地位，因而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另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如何理解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认为哲学是非经验性的科学抽象，它只能囿于思维领域、高高在上，对人的大脑发生作用，而不能从思维的高层下放到现实生活的底层，同人民群众发生联系，对革命实践起指导作用；另一种是把哲学看成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仲裁各门科学是非的“裁判”，因而搞所谓的“对号入座”、“贴标签”。作者不同意这两种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方法论功能，“高层——底层——高层”就是这种功能显现的基本途径，并以毛泽东大革命时期的思想与实践为范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证。还作出了许多含有新意的概括。比如，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哲学萌芽的提法及其内涵的规定，关于党创立至大革命时期三大类型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分及其根据、意义的阐发；关于李达、瞿秋白、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共性和个性，作用和地位的分析；关于毛泽东大革命时期思想与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及其显现途径的论述，等等。本书的逻辑结构，从标题到章

节的布局，也都追求程度不同的新意。诚然，这些究竟能不能立得起来，还很没有把握，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赐教。

还应该提到的是，本书在论述中，强调了认识和把握国情的重要，并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列举史实，突出了党及其领导人，在同种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中，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这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其内容的最初论述。这就使得本书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韶山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和《求索》杂志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一表示感谢。

作 者

一九八七年十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阶段	(1)
一 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队伍的深刻变化.....	(2)
二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渠道的不断扩大.....	(9)
三 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内容的逐步深广.....	(16)
四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态度.....	(28)
五 推动变化的合力.....	(38)
第二章 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萌芽	(46)
一 涵义.....	(46)
二 起点.....	(49)
三 标志.....	(54)
四 三大类型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在中国无产阶级 哲学萌芽中的作用与地位.....	(80)
第三章 李达的哲学思想	(95)
一 提倡并实行“结合”.....	(95)
二 由侧重理论传播转向侧重实际应用 再转向侧重理论阐发.....	(99)

三	理论阐发的代表作·····	(109)
四	两个特点·····	(121)
第四章	瞿秋白的哲学思想·····	(130)
一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阐发·····	(130)
二	目的在于实际应用·····	(135)
三	在实际应用中展开的哲学观点·····	(143)
四	理论阐发和实际应用的特点·····	(177)
第五章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189)
一	思想与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 及其显现途径·····	(189)
二	形成和提出中国革命最初战略构想的科学 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	(209)
三	在自身思想发展的历史链条和全党思想 画面中的地位·····	(225)

第 一 章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后，即越过高山和海洋，冲破阻力和封锁，传遍欧美大陆。它在近代中国的介绍和传播，尽管由于近代中国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比它在欧美大陆的传播晚了半个世纪多，但由于近代中国毕竟同欧美大陆处于同一人类发展的历史链条和同一世界的广阔画面上，更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①，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共同利益，因而势必引起近代中国前仆后继、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分子的注意，被他们介绍和传播到社会历史条件正在发生急遽变化的中国国土上来。

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介绍和传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因为中国共产党这一开天辟地事变的发生，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全面传播和最初应用、造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中国无产阶级科学思想萌芽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心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紧紧抓住这种关系，并围绕这种关系的实际展开而来的四个问题，即介绍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5页。

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渠道、内容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考察从19世纪末至大革命失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介绍和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分析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无产阶级科学思想萌芽的社会条件与历史必然性，是很有必要的。

一 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队伍的深刻变化

科学是无国界的。在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的中国，即使社会历史条件并不具备，况且封建统治者长期搞锁国闭关，一切反动势力都感到恐惧的“共产主义幽灵”，也开始从欧美大陆“游荡到中国来了”^①。撇开外国传教士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文章不谈，中国人也在20世纪初写出了提到或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文章。从1902年开始，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新民丛报》上，相继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等论著，几次提到了马克思，多处谈及社会主义，并且首先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指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中的“泰斗”和“鼻祖”地位。不久，《民报》刊登的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把当时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1907年及以后，《天义报》登载刘师培的《社会主义学说发达考》、《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等文章及其他

① 参见邓明以：《〈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诞生》，载1980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

译作，将这种介绍继续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些不断递进的史实，说明当时的中国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确实作了一些介绍，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积极作用。只看到这些思想家的阶级局限、写作动机和文章的中心思想，而不问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时所受的社会历史条件限制和达到的客观社会效果，一概否认他们的这种介绍及其积极作用，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当然也应该看到，他们的文章和译著，虽然一再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生平和事迹，虽然反复谈及社会主义，但是这些作者或译者，并不能明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一律称之为“社会主义”，有的还译作“民生主义”。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模糊以至歪曲的认识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还只是最初的启蒙式的介绍，不能评价太高。

正如大家已经知道的，在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启蒙式介绍的思想家，从阶级属性上说，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从政治主张上说，他们当中实际存在三个派别，即：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派（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朱执信、刘师培和《新民丛报》、《民报》、《天义报》等，即分别为这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主要代表报刊。当时介绍马克思主义队伍的阶级构成和政治信仰复杂的这种情况，首先决定了他们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内容和态度上的具体差异；尤其决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至多也只能是启蒙式的介绍，必定要被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而起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播所代替。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起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科学传播的时机成熟了，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自然发生了重要的转移。十月革命前，对马克思主义作过启蒙式介绍的那些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因为阶级立场和阶级特性所决定，而没有能够把他们的介绍继续下去，个别的还坠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的论敌。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影响，而成为赞成俄国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头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而后就是或多或少受过他们思想影响的进步学生，如李达、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不论是李大钊和陈独秀，或是后起的一批革命青年，原先，他们也都是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所不同的是他们既有改造中国社会、振兴中华民族的强烈爱国心和紧迫责任感，更有始终不渝地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坚强意志和一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因而当他们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战场上走下来，动摇了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信仰之后，依然继续不懈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马克思学说，便立即感兴趣，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从思想到行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他们由一般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或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他们分别组织社团，创办刊物，撰写文章，翻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国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使马克思主义开始以其固有的科学面貌在中国传播开来。1919年5月、11月，李大钊在

《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中国学术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在比较完备的意义上开始在中国科学传播的真正开端。陈独秀、李达、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著述和翻译成果，又使这种传播有了多方面的展开。关于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在党创立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学术界早有专题研究，已为人们所熟知，这里只着重研究张闻天的功绩。张闻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绩，集中于他在1919年8月19日至21日，发表在《南方学生联合会月刊》上的《社会问题》一文。该文的突出之点在于：（一）明确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人类社会，这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传播者发表的文章几乎是同时的。（二）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虽是朦胧的但大体是正确的见解，这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也是难能可贵的。（三）全文列举了《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它是中国传播《宣言》的最早文献之一。（四）在当时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时，成为反映当时先进分子共同趋向的一份具有时代特征的文件。

在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张闻天等一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推动下，各地的新文化刊物发表了大量的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不能不使当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承认：“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研究鲍尔什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

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合，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①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传播，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十月革命以前，但又远远不如党创立以后。

1921年7月，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和帮助下，经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酝酿和筹备，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一大正式宣告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②。从此，中国共产党就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同时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主体力量。

诚然，在中国，作为阶级的政党介绍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的。早在民国初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也曾经接触和介绍过马克思与社会主义。然而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中国社会党并没有也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貌来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它所标榜的社会主义仍然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党不断蜕变分化，到党创立至大革命时期，它的领袖江亢虎，终于沦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敌之一。在中国，公开宣布以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阶级政党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从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力量上讲，党创立后较之党创立前，至少有两个明显不同的地方，即：（一）从马克

①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载上海《东方杂志》1922年2月25日第18卷第4号。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51页。

思主义者个人到马克思主义者集体；（二）从无领导、无计划到有领导、有计划。其具体表现是：作出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决议；建立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出版发行机构；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党校及社团；编辑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组织纪念革命领袖活动；党的领导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写作发表了数以千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他们在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翻译出版了20多种马克思主义原著。这无论在种类还是数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9世纪末至大革命时期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队伍如此深刻的变化，即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经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说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尽管立于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历史长河的起点，因而在客观上的确起了某种先驱者的作用；但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受资本帝国主义的打击，内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需要革命；然因它在来源和欲望上，与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革命又往往表现出怀疑、动摇、妥协以至反对的态度。小资产阶级虽然整个说来是革命的阶级，但是在政治上有时也有类似资产阶级的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这种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和它自身经济地位的阶级特性，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的先进阶级，因而也就决定了它们的思想代表，不可能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启蒙式介绍继续推向前进，成为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科学传播的主体力量。这个主体力量，必须是、也只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也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由于它同这个社会的先进生产力相联系，而且因为具有，第一“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经济地位低下”，因而“特别能战斗”的特点，成为“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①，做了唯一能够拯救国家、振兴中华的领导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应用和发展的真正阶级的依托和归宿。再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也只有是无产阶级的独立存在，且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国度里，才有可能得到科学的传播、应用和发展。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主要是通过它的思想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播，并使这种传播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来实现的。而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并非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也不是一开始就和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的革命知识分子，而是在他们持久不断地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其思想政治信仰逐步由改良转向革命；特别是在他们接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进一步清理了改良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发生了立场和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即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的。这就是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科学传播，就不可能造就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同样，没有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也就不可能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中国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萌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